

颜氏家族的语言文字观及其影响

徐 秀兵

I 颜氏家族的血缘谱系及语言文字学论著概况

颜氏“本出颛顼之后”(史游 1989: 59), 其家族可谓源远流长⁽¹⁾。颜友为颜姓第一人。在春秋时期, 颜氏成为鲁国望族。颜友传至第十七代为颜路, 颜路之子乃颜回。颜路与颜回“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 颜氏有八焉。四科之首, 回也, 标为德行。”(《急就篇注·叙》) 颜回在孔门弟子中名望最高, 极受后世儒家及历代帝王的推崇, 其后人固守颜姓至今。

颜回后裔世居于鲁, 至二十四代孙颜盛, 于魏文帝黄初年间迁琅邪临沂, 历四世约八十年, 至西晋时被誉为“琅邪颜氏”。晋惠帝在位时政治腐败, 八王战乱相继。永嘉元年(307), 颜盛曾孙颜含率家族追随琅邪王司马睿南渡建康。东晋至南北朝时期, 颜氏后裔在江南建康长干里一带定居九世约 270 年, 子孙繁衍, 居官者众多, 形成江南颜氏巨族。公元 554 年, 西魏军队攻破金陵, 颜回三十五代孙颜之推被俘, 率家人先后到达北朝。在北周建德六年(577), 颜之推应武帝征召, 举家随驾入关, 定居京城长安。

颜之推(531-591), 字介, 一生播越南北, 历仕四朝, 平生为官以在北齐任黄门侍郎为最显。《颜氏家训》是其思想道德、学术文章的集中体现, 其中《书证》《音辞》等篇章集中讨论了语言文字问题。颜思鲁, 之推长子, 精于文字音韵, 于隋朝任东宫学士、长安王侍读等职务, 入唐之后, 李世民任为秦王府记室参军。颜愨楚, 之推次子, 著有《证俗音略》二卷。颜游秦, 之推三子, 撰有《汉书决疑》。

颜思鲁有子四人, 长子师古与三子勤礼的后人相传谱序清晰, 二子相时、

(1) 有关颜氏家族的谱系情况, 详参都惜青《唐代颜氏家学考论》(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第一章《唐代颜氏世系行状考述》以及王春华《唐代颜氏家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四子育德之后嗣已无明确记载。颜师古(581-645),名籀,著有《汉书注》、《急就篇注》、《匡谬正俗》,编写了《颜氏字样》。勤礼,字敬,“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诂训,秘阁司经,史籍多所刊定……与兄秘书监师古、礼部侍郎相时齐名”(《颜勤礼碑》)。入唐之后,颜氏家族因颜勤礼一支名卿众多、人才济济,成为颜氏后裔最为辉煌的时期。

颜昭甫,字周卿,勤礼长子,“少聪颖,而善工篆隶草书,与内弟殷仲容齐名,而劲利过之,特为伯父师古所赏,凡所注释,必令参定焉。为天皇晋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篆书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识之。”(《颜勤礼碑》)

颜元孙(?-714),字聿修,昭甫长子,约活动于高宗至玄宗时期,少孤,寓居舅殷仲容家,由殷氏教授书法,历官长安尉、太子舍人及滁、沂、豪三州刺史,追赠秘书监,撰有《干禄字书》。颜惟贞(669-712),字叔坚,昭甫次子,唐代知名书法家。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颜惟贞六子,主要活动在玄宗至德宗朝,经历了唐朝由盛及衰又走向中兴的历史阶段,为官四方,转任南北。任湖州刺史时,他广罗文化精英,穷数十年之功而编纂音韵学著作《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

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九九初步综括了颜氏家族语言文字研究和著述的历史脉络:“颜氏自之推以后,类能研覃经史,著书立说,而于六书声韵之学,尤有专长。其所撰述,此书(《干禄字书》)之外,载隋、唐两《志》经解、小学类者,则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训俗文字略》一卷、《笔墨法》一卷,愍楚《证俗音略》一卷,师古《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真卿《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余如之推《家训·书证》篇、游秦《汉书决疑》、师古《汉书注》诸书,皆于小学家言再三致意。是则一门著作,多有渊源,其讨论之功,非止旦夕。”

II 颜氏家族语言文字观的主要内容

本文的“颜氏家族”主要指颜之推及其后人,其中颜之推、颜师古、颜元孙、颜真卿四位在语言文字学史上的地位最为显赫,他们集中代表了颜氏家族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学术观点。

颜氏家族满怀对汉语言文字的强烈热爱,坚守汉语作为母语的正统地位,主张以周秦以来通用的汉语言文字为教学之正宗,反对学习异族语言以猎取禄利。《家训》旗帜鲜明地指出:“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解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王利器 1993: 21)

魏晋隋唐时期的颜氏家族既有血缘关系,更有相通的学术观点,他们秉承经世致用的儒学渊源,执着于薪火相传的学术接续,在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均成果昭著,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试从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三个方面,分述颜氏家族语言文字观的主要内容。

1 音韵学

音韵学是研究汉语汉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读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

颜之推首次简单勾勒了汉语音韵学发展史,认为“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音辞篇》),提出了汉语语音古今演变的思想。他既注重理论上的思考,也在实践上贯彻其学术主张。隋开皇二年(582),他参与讨论音韵问题并完成《切韵》初稿⁽²⁾,因“《切韵》之分声与析韵,多本乎颜氏”(王利器 1993: 567),《音辞篇》也被公认为《切韵》成书的重要基石。

颜师古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的音韵学思想,在“古音”学上有诸多开创性的成果(详参张金霞 2006: 44-59),表现在:(1)注意到古韵部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首创了指称先秦两汉时代语音的“古韵”术语。(2)根据古代韵文把能押韵的字归为一类,用“以韵求音”法初步进行了古韵分部的实践,从《汉书》师古注出的“谈”、“阳”、“鱼”、“宵”四部,可以窥知师古初步具有了古韵系统观。(3)注重谐声偏旁和汉字读音及词义的关系,用谐声偏旁或同谐声偏旁的字注音,从而探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汉书·高帝纪上》“沛公引兵绕关峣”,师古注曰:“峣音尧。”“亦视项羽无东意”,师古注曰:“视音示。”“(秦王子婴)降枳道旁”,师古注曰:“枳音积。”又“故秦苑囿园池”,

(2) 《切韵》以当时的读书音为基础,兼顾古音、方言编辑成书,描写的不是某时某地的一个单纯音系,而是该时期语音的综合反映。

师古注曰：“囿音宥。”

2 训诂学

传统训诂学以研究古代文献语言的词汇语义和训释条例为主要内容和基础工作，还包括后来的语法学、修辞学和篇章学等内容。早在颜之推《书证》篇已有大量关于经史文献的训诂实践。而在颜氏家族中，当属师古的训诂学成就最为显著。

《汉书注》、《急就篇注》和《匡谬正俗》等著作奠定了颜师古在训诂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解释词义方面，师古贡献颇丰：(1)在随文释义时，对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等作了一定的探索，并采用了形训、声训、义界等多种释词方式。如《汉书·高帝纪》“沛公、项羽追北”，师古注曰“北，阴幽之处，故谓退败奔走者为北”，继而引《老子》《说文》《史记》后指出“北即训乖，训败，无劳借音”，批驳了韦昭以北为背的假借字之说。(2)注重追溯词源，探求词的得名之由。如《汉书·律历志》中的八音之一“木曰柷”，师古注曰“柷与俶同，俶，始也。乐将作，先鼓之，故谓之柷。”(3)注重考察口语词和方言词语的历史演变。《匡谬正俗》可称为口语词研究的开山之作，记录了大量口语词且利用语音演变的轨迹进行溯源，认为大部分口语词的产生是由于俗语音讹、音转造成的；《急就篇注》中有21条方言俗语研究材料，体现了颜师古方言俗语研究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搜采当时方俗语并重的研究特点（王智群 2008）。(4)以《汉书注》为代表的义训术语体系已接近完备，大多数义训术语已经基本定型，且具有概括性和稳定性等特点，揭示了唐代训诂学中义训术语的基本面貌（胡继明 2013）。(5)颜注初步揭示了一些特殊词法和虚字用法。如师古注《高帝纪》“啗以利”曰“啗者，本谓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喂人，令其啗食，音则改变为徒滥反”，对动词的致动用法和四声别义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再如师古注《隽不疑传》“廷尉谿治何人”曰“凡不知姓名及所从来者，皆曰何人”，揭示了“何”字的虚指用法。远在一千多年前的颜师古“对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虚词给予了高度重视，多方诠释，这显现了他朴素的词法思想”（王宇 1992）。

3 文字学

汉字作为典型的表意文字，可突破一定的时空局限，起到“前人所以垂

后，后人所以识古”（《说文解字》序）的社会功能。文字学以研究汉字的形体演变和使用规律为主要内容。

汉字的使用包括个人使用、社会通行和权威规范三种基本场合。颜之推可谓汉字规范的先驱，他服膺文字规范的典要之作《说文解字》，说它“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书证》）。他在《家训》中指出了魏晋六朝时期楷书字体从确立到定型的过程中，字形方面正俗并存的现象，呼吁必须统一汉字形体⁽³⁾。

贞观初年，唐太宗以政府行为开始推行汉字规范工作，其领军人物正是时任中书侍郎的颜师古。师古于贞观七年编定《颜氏字样》作为楷体规范的依据在社会上推行⁽⁴⁾。颜元孙继承《颜氏字样》的学术精神编定了《干禄字书》。《字书》以应对科举考试、谋求禄位功名为目的，是“寓字书于韵书之中的字书”⁽⁵⁾，全书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按照使用场合将字样分为俗字、通字和正字三种类别⁽⁶⁾，共整理汉字804组，凡1656字，其中包括707组异体字和97组易混字⁽⁷⁾。《字书》意在指导社会用字，不逐字说解字义，而是注重规范汉字的构形属性和书写属性，在维护汉字表意性的同时更兼顾汉字的社会性。罗振玉《干禄字书笺证》在弁语中赞之曰：“小学盛于汉，晦于六朝，渐明于唐。汉唐间诸字书，《说文解字》外，晋有吕忱《字林》，梁有顾野王《玉篇》，其书详矣、备矣，然多存后世俗作，意在补《说文》所未备。

(3) 《颜氏家训·杂艺》曰：“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4) 颜元孙《干禄字书·序》曰：“元孙伯祖（师古）故秘书监，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颜氏字样》原书早已散佚，民国汪黎庆曾辑得《颜氏字样》一卷，收录于《广仓学丛书》中。

(5) 黄侃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将字书分四种：读书式之字书、分形之字书、分韵之字书和编画之字书。参见（黄侃 1983: 13）。

(6) 颜元孙《干禄字书·序》曰：“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僥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牋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若须作文言及选曹铨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7) 据刘中富（2004）的统计结果。

其实所收之字多无意义,大抵皆增其所不必增,于六书殊无裨益。惟唐人《干禄字书》、《五经文字》实能祖述许书,折衷至当。《五经文字》犹偶有疏舛,《干禄字书》则有纯无驳。”

综上所述,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颜氏家族由研“经史”而治“小学”,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等方面均多有建树,他们坚信汉语和汉字作为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标志性作用,看到了汉语言文字具有音、义、形三位一体的特征,认识到汉语、汉字的历时发展和共时通行这两个重要维度,全面客观地分析雅言与方言、通俗字与正字的辩证关系,既注重从理论上对语言文字的源流发展规律进行考察,也注重在实践上对语言文字在当下的社会流通进行规范,初步形成了系统性的语言文字观,且日趋丰富和严密。

III 颜氏家族语言文字观的社会效应及其影响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明亡后,面对士大夫纷纷改仕清朝的士风败坏和鲜廉寡耻,他恪守华夏民族“以文立国”的传统,对颜之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日知录·廉耻》中引述《颜氏家训》鄙夷齐朝士夫教儿鲜卑语之事,并感慨道:“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顾氏这种坚守本族母语和历史文化的忠贞气节也直接影响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炳麟,因反清排满意识浓厚,慕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他是民族主义思想大师,被时人誉为“中国的玛志尼”。1902年,章太炎在《馗书》中指出:“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章太炎 2002: 264)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表演说,号召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此处的“国粹”指广义的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可见,传承和弘扬以母语——汉语为根基的本国历史和文化是爱国学者所坚守的一种“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以下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颜氏家族语言文字观的社会效应和对后世的影响。

1 音韵学

颜之推《音辞篇》对汉语语音古今变化的初步认识启迪了明清古音学家。

明代陈第(1541-1617)将颜之推的语音变异论进一步发展,在《毛诗古音考·序》中提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开了古音研究的新纪元。陈第作为古韵学的开路先锋,有了汉语语音因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观念,从而使“古韵”研究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颜之推《音辞篇》同时开了韵书分韵正音之先河,后来的《切韵》之分韵注音无不与颜之推《音辞》篇所论相合。《切韵》音系是中古音和近代音的基础,也是研究上古音的枢纽和关键。因此,《切韵》为代表的今音学也成为现代音韵学的基础⁽⁸⁾。

在雅言和方言、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上,颜之推一方面极力维护雅言的正统地位,认为“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音辞》)。他“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覈折衷,推而量之”,认为六朝官方雅言的语音当以金陵洛下为正,这一观点深刻影响到后世官方雅言标准音的确定,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就是以有着帝王都邑传统的北京音为基础语音。同时,颜之推看到了汉语与民族语言、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音辞》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音韵学史上“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的重要命题,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持续关注,例如鲁国尧《“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⁹⁾。

颜师古在音韵学方面更是贡献卓越:(1)他提出了“古韵”的概念,而且其“古韵”分期与后世学者对语音史的研究共识是一致的。师古《汉书注》因保存重要的反切材料,被黄侃列为“考见汉魏数百年音韵之变迁”的要籍(黄侃 1983: 147)。(2)师古利用排比韵脚的方法考求古音,为明清古音学家所继承和发展。顾炎武以《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的押韵情况为根据,将古韵分为10部。在顾氏10部的基础上,江永将古韵分为13部,段玉裁分为17部,孔广森分为18部,王念孙、江有诰分21部,章太炎分23部(王力 1963: 123)。正如黄侃(1983: 143)所言:“推求古本音之法,最初为比对韵文。陈(第)、顾(炎武)、江(永)之言韵,不过挤韵脚之法。乾嘉以来,亦因此法。”因此,师古的“这种方法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给后人开辟了一条

(8) 音韵学分为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三个主要的部门。今音学以《切韵》系韵书为对象,研究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语音系统;古音学以先秦两汉的诗歌韵文为材料,研究上古时期的语音系统;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为研究对象,分析韵书中的反切,基本上就是分析《切韵》系韵书的反切所反映的语音系统。

(9) 参见鲁国尧《“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分载于《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和2003年第2期)。

考求古音的康庄大道”(张文轩 2013)。(3)师古对韵部之间远近亲疏关系的论述,对后人研究韵部排列也很有启发意义。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17部,又据音之远近分为六大类,每类之中包括若干韵部,皆依音之远近排列,“段氏能这样排列古韵,应当说也是上有所承,所以不可否认其中也有颜师古的发端之功”(张金霞 2006: 49)。(4)师古明确地揭示了谐声偏旁在标音方面的作用,为后人利用谐声偏旁推求古音作了很好的提示,段玉裁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凡同声者必同部”的重要理论。

颜真卿所撰《韵海镜源》作为“以韵隶事之祖”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封氏闻见记》卷二记载其体例:“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为声韵已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封演 2005: 14)《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极力肯定此书对后世的影响:“颜真卿《韵海镜源》世无传本,此书(《封氏闻见记》)详记其体例,知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实源于此。而后人不察,有称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说为杜撰欺人,并知《永乐大典》列篆隶诸体于字下,乃从此书窃取其式,而讳所自来。”(封演 2005: 104-105)

2 训诂学

杂记训诂体式产生于南北朝时期,今存最早的当属颜之推《家训》中的《书证》篇,其校勘部分启迪了近代学者王国维所开创的“二重证据法”,而此法又被公认为考证古代历史文化的“学术正流”。

颜师古“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历时四载完成《汉书注》,时人誉之为“班孟坚功臣”。颜注为后世训诂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例如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就有“《汉书》杂志”十六卷辨正《汉书》及颜注280余条,王先谦《汉书补注》也是在颜注基础上的补充和发展。

师古感于先父思鲁“常欲注释《急就》以贻后学”却“雅志未申”之遗憾,“尊奉遗范,永怀罔极……遂因暇日,为之解训”,以求“祛发未寤,矫正前失”(《急就篇注·叙》),“自颜注行而魏晋以来旧本微”(王国维 1959: 258),师古《急就篇注》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师古生前“尝撰《匡谬正俗》,草稿才半,部帙未终”。师古死后,其子

扬庭“敬奉遗文，谨遵先范，分为八卷，勒成一部”，希图此书能收“百氏纒繆，虽未可穷；六典迂讹，于斯矫革”（《上匡谬正俗表》）之效。《匡谬正俗》是最早的杂记训诂体式的专书，韩愈在他为李贺因父名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辩解的名文《讳辩》中，就曾引用《匡谬正俗》中的“禹字、丘区”之论。《匡谬正俗》更是启迪了顾炎武《日知录》等为代表的明清考据学的研究。

在训诂学理论探索和实践方面，以师古为代表的颜氏家族对后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1)师古《汉书注》等著作利用形声字的声符线索破通假、释源义和标古音，推动了宋代“右文说”的产生；(2)师古继承并发展了《释名》为代表的声训体例，开清代以声音通训诂方法的先河，对后世的语源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章太炎《语言缘起说》曾引师古《匡谬正俗》卷六之獠条，认为“今之戎兽，字当作獠，戎獠一音之转。猴类得名，亦由人之转音，此可互证”（章太炎 1996: 30）。章氏的语言学巨著《文始》更加集中地考察了汉语同源词族，章黄学派的后继者陆宗达、王宁等则建立和发展了科学词源学和词汇语义学，使训诂学的知识本体和术语体系更为完备⁽¹⁰⁾。(3)颜氏家族对具体词条的探索也引起了人们的持续思考和研究，例如对“草马”一词的探讨等⁽¹¹⁾。(4)颜氏家族的训诂思想还影响了后世的词法和语法研究。有学者指出，从《汉书》颜注中的“恭应之辞”、“嗟叹之辞”、“句绝之辞”到杨树达《高等国文法》中的“应对副词”、“叹词”、“语末助词”等，可窥见颜师古在虚词研究方面“筌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劳。

3 文字学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可谓是俗字研究“导夫先路”之作（张涌泉 2010: 254）。针对当时社会用字的混乱状况，颜之推认为“必依小篆，是正书记”的做法是“不通古今”，进而提出了发展变通、宽松适度的规范观念：既承认《说文》正字，又承认流俗文字的合理地位。这种汉字规范观念影响了时人，更为后人所传承和发扬，形成了由颜之推开其端，颜愨楚步其后，

(10) 详见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和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之《训诂学》部分。

(11) 早在颜之推《家训·书证》篇“駟驹牡马”条已经提出“驩”（“草”的俗体字）的词源问题，师古《匡谬正俗》卷六“草马”条认为“草之得名主于草泽”，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草马”承袭颜氏家族之说，曾良《“草马”探源》（《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一文对“草”的词源和释义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草”的语义来源于“阜”的槽义，意指牝。

奠基于颜师古，而集大成于颜元孙的字样之学。师古之后的字样学以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最为有名。有人通过对部分唐代碑志文字的测查得出：唐初的碑志中，《干禄字书》通、俗字的使用很多，在千字以上的碑文中，通、俗字比例往往达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盛唐、中唐的碑志中，通、俗字使用比例明显减少，降为百分之三左右（施安昌 1992）。可见，《干禄字书》为代表的正字工作限制了歧异字形的大肆泛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世字书效法《干禄字书》者众多，如宋代郭忠恕《佩觿》、张有《复古编》及元代周伯琦《六书正讹》等等，使字样之学蔚然成风。清代王筠的《正字略》是参仿《干禄字书》体例编撰的字样学著作，从二书共收的字头看，凡颜氏所论俗字、正字，王筠大多予以继承（蒋志远 2013）。难怪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九九对《干禄字书》大加赞誉：“元孙《字书》，繁简得中，辩证确凿，为历代楷模者，宜也。”

《干禄字书》的正字观在当代的汉字整理规范工作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字书》根据社会用字的场合将字样分正、俗、通字，显示了对汉字字形分类、分级整理的思想；《字书》承认了俗字的通行度和社会性，初步显示了汉字整理的字频观念；《字书》中“同偏旁者不复广出”的体例，初步显示了汉字简化时基于字表的有限类推思想；《字书》既注重规范字形又注意规范字用，体现了对字际关系的整理意识，上述诸多思想依然闪耀着纵观古今的智慧之光。

颜真卿书艺精湛，备受时人和后世的推崇⁽¹²⁾。大历九年（774），时任湖州刺史的颜真卿将《干禄字书》摹写刻石，立于刺史院东厅。因其书法精美，刻石一立，便“一二工人昼夜传拓不息”。另外，颜体对宋刻版楷书字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曰：“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可见，颜真卿“法书”对社会通用文字书写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具有权威示范作用。字是写出来的，汉字只有书写才会亲切（王宁 2012）。在重视弘扬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时代思潮下，颜真卿的法书必将在汉字认知和书写领域继续深刻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2) 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IV 余论

颜氏家族秉承从儒家经学到传统小学的治学道路，对语言文字学表现出执著的追求，在传统小学各个领域都有巨大的贡献。尽管颜氏家族的语言文字研究并非无可争议，比如颜师古《汉书》注中的“合韵说”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而颇受批评（马重奇 1989），颜之推、颜师古将部分连绵词分训，如释“狐疑”为“狐之为兽，其性多疑”，为治训诂学者所诟病。但是瑕不掩瑜，颜氏家族在汉语言文字的音、形、义三个研究领域均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对明末清初顾炎武、清代乾嘉学者和近世章黄学派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初的顾炎武等人矫正明末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之弊，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顾氏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考据为津梁，讲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奠定了有清一代即音求义的训诂方法论基础。

乾隆年间的戴震更明确地批驳了轻视语言文字的错误倾向，他说：“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戴震继承顾炎武的音韵、训诂之学及考据方法，认为“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与是仲明论学书》），主张“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古经解诂·序》），这种从文献语言出发，形、音、义互求的训诂方法，影响和支配了此后的整个考据学界，奠定了语言文字学的基础。而段玉裁和王念孙又得戴学之真传，开辟了词义研究的新领域，将乾嘉学术推上了顶峰。乾嘉学术以段、王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从经传单字单义的训诂上升到语言文字系统内部规律的探求，从而为近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特别是文献语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传统小学的殿军人物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说：“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章氏治学是为振兴民族文化、唤起爱国热情的经世致用的革命思想所激励的，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小学的最佳成果而多有创新，对旧经学、小学作了全面的总结，为新的语言文字学的创建和发展构筑了框架，指明了方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黄侃受学于章太炎，继承师说又有所发展。黄侃（1983: 149）总结了研究语言文字之学时音韵、文字和训诂互相为用的逻辑：“音韵者何？所以贯串训诂而即本之以求文字之推演者也。故非通音韵，即不能通文字、训诂，理固如此。然不通文字、训诂，亦不足以通音韵，此则征其实也。音韵不能孤立，孤立则为空言，入于微茫矣。故必以文字、训诂为依归。然则音韵虽在三者为纲领，为先知，而必归于形义，始可为之锁钥也。”今天，这段精彩论述仍被视为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原则。章、黄师徒二人及其再传弟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学术继承人，学术界以“章黄学派”誉称他们开创的学术，足见他们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地位和影响。

参考文献：

- 封 演（2005）《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胡继明（2013）颜师古《汉书注》义训术语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黄 侃（1983）《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蒋志远（2013）《正字略》及王筠正字观刍议，《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刘中富（2004）《〈干禄字书〉字类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 马重奇（1989）颜师古汉书注中的“合韵音”浅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施安昌（1992）《颜真卿干禄字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史 游（1989）《急就篇》，长沙：岳麓书社。
- 王国维（1959）校松江本急就篇序，《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
- 王 力（1963）《汉语音韵》，北京：中华书局。
- 王利器（1993）《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 王 宁（2012）书写规则与书法艺术——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王 宇（1992）汉书师古注的虚词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
- 王智群（2008）《急就篇》颜注引方俗语研究，《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张金霞（2006）《颜师古语言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张涌泉（2010）《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文轩（2013）颜师古的“合韵”和他的古音学，《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章太炎（1996）语言缘起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章太炎（2002）《楹书》，北京：华夏出版社。

附记：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5YJ080203）的阶段性成果。